

张弘 著

BASHU GUJIANZHU

巴蜀

古建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巴蜀地区的古建筑概况

秦汉时期巴蜀建筑概况及影响因素

1.1.1 秦汉时期巴蜀建筑概况

1.1.2 秦汉时期政治、经济对巴蜀建筑的影响

1.1.3 秦汉时期文化融合对巴蜀建筑的影响

结论

第一章 巴蜀地区的古建筑概况

1.1 秦汉时期巴蜀建筑概况及影响因素

1.1.1 秦汉时期巴蜀建筑概况

1.1.2 秦汉时期政治、经济对巴蜀建筑的影响

1.1.3 秦汉时期文化融合对巴蜀建筑的影响

1.2 唐宋时期巴蜀建筑概况及影响因素

1.2.1 社会背景

1.2.2 巴蜀地区经济繁荣、都市兴起的影响

1.2.3 巴蜀地区政治、文化融合的影响

1.2.4 南宋时期的战争影响

1.3 元明清时期巴蜀建筑概况及社会背景

1.3.1 概述

1.3.2 巴蜀地区元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影响

1.3.3 文化的发展对建筑的影响

第二章 巴蜀地区的城镇、交通等建筑概况

2.1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城镇及水利

2.1.1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城镇

2.1.2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水利

2.1.3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交通

2.1.4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其他建筑

2.1.5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其他建筑

2.1.6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其他建筑

2.1.7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其他建筑

2.1.8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其他建筑

2.1.9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其他建筑

2.1.10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其他建筑

2.1.11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其他建筑

2.1.12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其他建筑

2.1.13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其他建筑

2.1.14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其他建筑

2.1.15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其他建筑

2.1.16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其他建筑

2.1.17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其他建筑

2.1.18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其他建筑

2.1.19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其他建筑

2.1.20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其他建筑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附录 (BIC) 目录表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蜀古建筑 / 张弘著.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647-2283-8

I. ①巴… II. ①张… III. ①古建筑—介绍—四川省
IV. ①K928.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4798 号



巴蜀古建筑
张弘著

出版: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成都市一环路东一段 159 号电子信息产业大厦 邮编: 610051)

策划编辑: 万晓桐

责任编辑: 万晓桐

主页: www.uestcp.com.cn

电子邮箱: uestcp@uestcp.com.cn

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85 mm × 260 mm 印张 19 字数 474 千字

版次: 2014 年 4 月第一版

印次: 2014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47-2283-8

定价: 4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本社发行部电话: 028-83202463; 本社邮购电话: 028-83201495。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绪论	1
第一章 巴蜀地区的古建筑概况	9
1.1 秦汉时期巴蜀建筑概况及影响因素	9
1.1.1 秦汉时期巴蜀建筑概况	9
1.1.2 秦汉时期政治、经济对巴蜀建筑的影响	11
1.1.3 秦汉时期文化因素对巴蜀建筑的影响	15
1.2 唐宋时期巴蜀建筑概况及对建筑的影响	21
1.2.1 社会背景	21
1.2.2 巴蜀唐宋时期政治、经济对城市、建筑的影响	22
1.2.3 巴蜀唐宋时期文化对城市、建筑的影响	25
1.2.4 南宋后期的战争防御	29
1.3 元明清时期巴蜀建筑概况及社会背景	29
1.3.1 概述	30
1.3.2 巴蜀地区元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建筑的影响	31
1.3.3 文化的发展对建筑的影响	33
第二章 巴蜀地区的城镇、交通等建筑概况	37
2.1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城邑及水利、交通建设	37
2.1.1 秦汉时期城邑发展	37
2.1.2 秦汉时期水利工程及交通系统建设	45
2.2 唐宋时期巴蜀城市及地区建设	51
2.2.1 唐宋时期巴蜀城市的发展	51
2.2.2 唐宋时期的城市街道	59
2.2.3 宋末防御城市的兴起	64
2.3 元明清时期巴蜀的城镇建设	70
2.3.1 元明清时期巴蜀城镇的整体发展及分布状况	70
2.3.2 府(州)、县城的形态、构成要素及建筑内容	72
2.3.3 重要府城的发展状况	73
2.3.4 场镇的发展、分布及类型	76
第三章 巴蜀地区的古代建筑	81
3.1 秦汉时期巴蜀的古代建筑	81
3.1.1 秦汉时期巴蜀古建筑的实物遗存	81
3.1.2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建筑结构类型特征	83
3.1.3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建筑空间组合特征	95
3.1.4 巴蜀地区汉阙	98

3.1.5	巴蜀汉代崖墓	107
3.2	唐宋时期巴蜀的古代建筑	114
3.2.1	巴蜀的石窟寺	114
3.2.2	石刻中反映的建筑形式	117
3.2.3	塔	128
3.2.4	道教中的木构建筑	136
3.2.5	居住建筑与园林	138
3.2.6	书院	146
3.2.7	墓葬建筑	147
3.3	元明清时期巴蜀的古代建筑	156
3.3.1	元明清时期巴蜀宗教古建筑发展概述	156
3.3.2	宗教建筑	157
3.3.3	祠庙建筑	175
3.3.4	会馆建筑	185
3.3.5	住宅建筑	195
3.3.6	园林	199
3.3.7	其他	204
第四章	巴蜀地区的建筑技术、艺术和文化	209
4.1	秦汉时期巴蜀的建筑技术	209
4.1.1	秦汉时期巴蜀筑城技术	209
4.1.2	木作技术	211
4.1.3	砖石技术	224
4.1.4	建筑空间技术	227
4.1.5	秦汉巴蜀建筑及技术的影响	229
4.2	唐宋时期巴蜀建筑技术和艺术文化	232
4.2.1	唐宋时期巴蜀建筑与艺术	232
4.2.2	建筑技术	248
4.3	元明清时期巴蜀的建筑技术	263
4.3.1	元明清时期巴蜀建筑技术概述	263
4.3.2	大式建筑的大木技术	265
4.3.3	小式建筑的大木技术	275
4.3.4	木构建筑的屋面与墙体技术	281
4.3.5	砖石建筑技术	284
4.3.6	土工建筑技术	289
4.3.7	建筑构件的装饰	291
参考文献		297

绪 论

巴蜀位于我国西南内陆腹地,具有悠久的历史。学术界对于巴蜀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巴蜀主要是指中国西南地区以古代巴蜀为主的族群所居住的地区,主要在四川盆地及其邻近地区,其时代大约相当于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前后延续上千年。而广义的巴蜀则指包括四川省与重庆市两者及邻近地域的总汇。本研究的地域范围主要是指广义上的巴蜀。

巴蜀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及其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其建筑文化积淀深厚,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及内涵。巴蜀地区的古建筑的风格具有多样化、地域化、包容性等特征,伴随着与自然环境密不可分的建筑与城镇形态。建筑产生于自然环境之中,任何一个古建筑都是在一个特定的地点上建造起来的。在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环境既带来了冲突与限制,也带来了和谐与创造。巴蜀古建筑的个性与特色,所反应的正是所处的本土环境特征的真实写照。

一、巴蜀地区的空间位置

巴蜀位于中国的西南部,既是西南丝绸之路的起始区域,更是西南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区域。西南为坤,“坤者,地也,土也,引伸为阴”。中国西部的西南地区相比较于中国的其他地区,这种传统地域特征是十分明显的。更重要的是西南地区地理环境多样,地形地貌复杂,地理纬度上跨越了10个纬度,但同时有海拔8000多米的高山与海拔76米的河谷并存。地理落差大,平原平坝、盆地丘陵、高原山地相间,垂直气候明显。既有终年积雪的高寒山地,也有亚热带特征的湿热河谷,还有典型的干热河谷。加上地处东亚大陆的西南民族众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多种多样,生产力水平不尽相同。这就使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居民的建筑形式千差万别,丰富多彩,成为中国传统原生态建筑的一个博物馆。

巴蜀文化的自然地理空间大致覆盖了今日以四川盆地和重庆为主及周边的区域。从整个中国版图上看,它处于我国两大古文明区域——黄河与长江流域文明的西侧。并且巴蜀位于西南地区腹地,而西南是中国三大文化板块延伸、接触、碰撞、交融的地区,即北方游牧文化区、黄河流域旱地农业文化区与水田稻作农业区,客观上导致了西南乃至巴蜀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今日四川行政区范围还涵盖了很大部分的羌藏文化区,而川西的羌藏文化区主要受北方游牧文化影响,与巴蜀本土地域文化源流性质有所不同。巴蜀地区在空间地理范畴上,主要被黄河流域旱地农业文化区及长江流域的水田稻作农业区所覆盖。

二、巴蜀古建筑的历史地位

巴蜀地区的古代建筑在中国古建筑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着自己特别的文化意义和影响。要真正弄清中国建筑史,离开了地方建筑史和民族建筑史是极不完全的。

巴蜀古代建筑的发展源远流长,与该地区开发较早有密切相关。且不说“蚕丛”、“鱼凫”、“开明”等古史传说记载,在考古发掘实物的证例中,新石器时代的广汉三星堆文化遗址的“木骨泥墙”和成都十二桥商周干阑建筑遗址,大大地丰富了中国早期建筑发展的内容,为中国传统木构体系建筑起源,力主“多源合流”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同时也奠定了巴蜀古代建筑文化的地方特色和独立地位。

秦汉时期,巴蜀建筑更有长足的进步,发展水平更为可观,在当时位于全国之前列。根据(晋)常璩《华阳国志》载,秦时的成都修建,已“与咸阳同制”。咸阳为秦之都城,与首都同制的地方城市相信不会太多。同书又载,汉时渝州山城“皆重屋累居”,可见近代时重庆吊脚楼据山而布的景象,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川渝出土的大量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和明器陶楼,鲜明记载了巴蜀古建筑从院落群体组合、单体形象、构造做法到装饰纹样等建筑特征和地方风格,成为国内研究汉代建筑发展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至于川渝所保存下来的建筑实物和遗址,其数量和质量,在全国可说是首屈一指,最为集中,尤以汉阙和崖墓为多。迄今已知全国有汉阙28处,川渝即有21处。雅安的高颐阙,渠县的冯焕阙均堪称上乘之作。道教建筑“观”的肇始,也出自汉代的四川。

唐宋时期,巴蜀建筑亦达到鼎盛,首先是由于巴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达,一直是封建王朝的重要支柱。“扬一益二”的说法,证实其时成都(益州)在全国经济上的地位。巴蜀建筑从汉代雄浑、朴实、简练的风格,经南北朝文化的变迁,到唐宋时代,更趋雄健,宏丽明朗,装饰手法臻于灵巧,精细多变,但并不琐碎。只是由于木结构在南方不易保存,川中没有留下遗构,而江油窦团山云岩寺的转轮藏,为宋代小木作精品,可由此推断大木作殿宇的建筑水平一定不低。从唐宋摩崖石刻中所表现出的建筑型制可间接证明,当时巴蜀建筑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如大足北山西方净土经变图,所展示的庞大殿阁楼台飞廊相连的建筑组群,实令人叹为观止。自南北朝佛教传播,凿崖兴造石窟寺之风大盛。至南宋,其他地区渐次式微,而发展重心南移至蜀中,同时营造与艺术作风也发生着根本性的转变。

元明清时期,巴蜀建筑类型增多,建筑规模及数量空前扩大,独创性更为突出,风格的趋同性进一步加强。巴蜀地区元代建筑留存不多,已知有峨眉山飞来殿、阆中永庆寺大殿。前者为国内元代较大型遗物,反映较多宋代特征。巴蜀大量古建筑为明清时代所建,乃为巴蜀建筑风格的集中体现。该地区的衙署、府邸、寺庙、宫观、会馆、民居、园林等遍及城乡各地,遗存颇丰。较著名的有始建于明正统四年(1439年)的平武报恩寺,是全国唯一的全寺所有的殿宇都是用楠木建造的大型寺院,其佛寺布局是宫殿寺庙混合型的海内孤例。梓潼七曲大庙是国内少有的大体量明代木构之一。清代的忠县石宝寨爬崖建筑,自贡西秦会馆牌楼组合式屋顶建筑显示了巴蜀建筑自成体系,独具一格而富于创造性的“川味”和“巴渝风”特色。

三、巴蜀古建筑的类型和特色

巴蜀传统民居建筑在建筑结构上简洁、朴素,大多就地取材。干阑式和穿斗式建筑是巴蜀传统民居建筑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筑聚落形式或傍水而筑,或临崖吊脚,或依山缠绕,或顺坡而上,主要建筑形式有廊桥、长廊、骑楼、吊脚楼等形式。基本架构采用

穿斗木构架体系,为穿斗木结构板壁或夹壁墙,桐油饰面露木本色,色彩朴素,本色或棕色的木架构与夹壁白粉墙形成对比,屋顶多以小青瓦覆盖。穿斗房、吊脚楼、栅子门、半边街、过街楼、石板路等建筑形成了巴蜀民居建筑景观。这些都是适应西南山地地形、气候水文、植被等的建筑样式。巴蜀传统民居建筑是当地人民通过长期的劳动、生产、生活总结出来的,是完全遵照山地“减少接地、不定地基、山屋融合”的理念建造的。巴蜀传统民居建筑由于地形的原因,使用了比较开敞自由的空间布局形式,没有十分严格的对称要求,随地势起伏的格局让平面和立面空间显得灵动有趣,地域性十分突出,建筑中的院落空间,主要有庭院、天井、抱厅等类型。庭院解决了采光通风和屋面排水问题,即采用檐廊、柱廊、敞口厅作为交通空间,联系各个院落或房间,天井用来采光通风。加上庭院比较宽敞,又常常作为家族议事、祭祖、红白喜事等活动的重要场所。当院落之间有高差变化时,常在中间设较宽的踏步,两侧设较窄的踏步联系上下空间。庭院的地面通常用青石板铺砌,四周有石材雕花地漏,用来排水。

巴蜀盆地内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水系发达,为人们生产生活创造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在长期生产、生活劳作的过程中,孕育出独特的巴蜀文化。自秦入川以来,本土文化就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入侵,明清之际两次“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活动,使巴蜀文化受到了更多外来文化的影响,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与发展。这种多元文化的碰撞和复杂的移民人口构成,对巴蜀城镇产生了重大影响,城镇建设表现为异域建筑风格、建筑式样、建筑技术的相互借鉴与融合,成就了巴蜀城镇多元化的景观特征。巴蜀山川秀丽,景色怡人,安定、娴静的山水环境不仅孕育出人们朴实、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而且城镇聚落中城墙、院墙均不转身背对山水,强调与自然山水的有机融合,致使聚落边界与自然山水融会贯通,合二为一,呈现出模糊、含蓄、隐喻等显著特征。巴蜀城镇普遍奉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高度重视并尊重基地自然环境的内在机理及自然规律,以满足古代经济文化基础、人的行为、心理特征为依据,由此形成不同的聚落形态。巴蜀历史悠久,2000多年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造就了巴蜀城镇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民族风情,文化的相互碰撞与融合折射在城镇聚落空间,即显现为“形神取意”、“寓意深远”的独特聚落形态,如罗泉的“龙形”、罗城的“船形”、石柱西沱的“蛇形”等,均具有趋吉辟邪的深远寓意。

巴蜀地区虽然地处偏僻,交通和信息都极为不便,但历来重视教育文化的发展。早在汉代就有蜀郡太守文翁兴办“石室官学”,大力提倡教育。巴蜀地区的书院兴起时间较早,在唐代就已有书院出现,明清时期更是发展迅速,清代巴蜀书院在全国各省的书院数量排名中为第二,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推动了巴蜀学术文化的繁荣。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形式。它起源于藏书和私人读书、授徒。始于唐,盛于宋,至明清达到顶峰。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大大超过并已取代官学,成为中国主要的教育组织,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书院亦称“精舍”、“精庐”或“书堂”,是中国古代官方、私人所办讲学授业之所。书院教育的产生在官学之后,其制度的最终确立,主要是官学自身的局限性和平民对受教育权利的追求所决定的。书院建筑作为书院文化的物化载体,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以教学、祭祀、藏书“三大

事业”为主，有强烈的“礼制”特征的平面布局，并在选址和风景环境的经营中，突出人与建筑、环境的协调统一，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是一种在文化内涵、艺术特色和审美风格上都有独到之处的建筑类型，也是中国传统建筑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巴蜀书院建筑也许算不得华丽，但它却表现得丰富而独特。巴蜀书院无论在选址布局还是在结合环境方面都体现了自然天成、天人合一的境界，是具有明显山地环境特征的建筑组群。同时作为民间建筑，书院较少受官式建筑的约束，而是取自民间建房搭屋的营造手段，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又使各个书院的建筑在形态与细部处理上略有区别，因而形成具有明显巴蜀地域特色但又异彩纷呈的风格。

巴蜀会馆建筑作为各省同乡聚会之所，是巴蜀移民社会生活的最具代表性的物化载体，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发展的过程与近代中国商人群体发展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又蕴涵了许多反映出中国社会这一特殊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活动中的内容。历史上，由于政府强权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战争和饥荒等因素的影响，人口的迁徙出现多次高潮，新移民由于对新环境的陌生，往往同宗同乡建立各自的“同乡会组织”即会馆，以联络乡谊和维护同乡人的利益为目的。根据刘致平在《中国建筑类型与结构》中记载：“清初曾大量移民入川，北城南城会馆达百余。”在《广汉县志》中记载：“康熙年，朝廷强制外省移民入川定居。乾嘉年间，汉州境内兴修同乡会馆共 36 所。”诸如此类的记载，在四川各县县志上皆有。民间一般都有“九宫八庙”之称。由此可见，自明以来“会馆”曾遍及整个巴蜀大地，可谓“城城必有，且每县（镇）不止一座，以湖广会馆（禹王宫）、广东会馆（南华宫）居多”。会馆大量出现之后，很快成为明清时期异乡人在客居地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和活动场所，同时也成为了一种精神依托。清代康熙、乾嘉时期巴蜀会馆盛行，有“繁不胜数”之称。清代吴好山《成都竹枝辞》中描述的“争修会馆斗奢华，不惜金银亿万花”，正是对清代巴蜀地区广置会馆的一个写照。根据对文献资料的统计，清代中后期巴蜀地区约有各种会馆约 1400 余座，是全国会馆最多的地区。这些会馆多分布于沿着江河水系或交通干道的中心城市或周边。如果以单个州县计算，清代中期巴蜀会馆最多的是绥定府（达州）、犍为、屏山等，都在 60 座以上；其次是宁远府、荣县、大竹、江津等，会馆数量都在 50 座以上。

摩崖石窟是重要的宗教建筑类型之一，是集雕刻艺术、宗教文化、空间处理为一体的特殊建筑形式。巴蜀地区摩崖石窟大量开凿于盛唐之后，兴盛于中、晚唐、五代，两宋时，巴蜀摩崖石窟开凿发展到巅峰时期，石窟开凿遍布于巴蜀的大部分地区。摩崖石窟的繁荣与巴蜀地区特殊的地理文化、地方经济，以及唐宋时期的历史背景等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石窟开凿技术和艺术的历史背景来看，摩崖石窟的开掘与巴蜀地区历史上崖墓开凿的技术基础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而摩崖的艺术表达与巴蜀地区的雕塑艺术发展、绘画艺术背景以及唐宋时期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都有很大的关联。摩崖石窟在巴蜀地区数量大，分布广，且分布密度大。这与巴蜀地区的水陆交通、城镇分布、历史区域划分、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其中，沿着红砂岩地区的重要水陆交通要道分布是摩崖分布的显著特点。唐宋期间巴蜀各地不平衡的宗教发展也影响着摩崖的分布。摩崖的地理选址通常注重选址地形的地理气势，并根据摩崖的艺术特点，注重自然形态的完整性，其选址与周围地理环境、寺庙建筑空间有着一定的布局规律。以摩崖为核心景观而逐年建立起来

的摩崖园林是摩崖石窟的建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经过长久的历史营建,巴蜀摩崖园林结合自然地理环境,逐渐添置历史人文景观,形成独具特色的摩崖景观。

画像砖、画像石是中国古代用在墓室建筑的主要装饰艺术品。画像砖、石作为一种具有装饰意义的建筑构件,始于战国晚期,盛于汉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继续流行。其中,汉代画像砖、石在出土数量、形制、构图形式、题材内容及表现手法等方面,均胜于其他时代,是汉代艺术最辉煌的标志之一。巴蜀地区出土的汉朝时期画像砖、画像石的形式整体雄沉,同时又具有东方的艺术美及工艺美。其题材广泛,其内容是对当时的生活环境、死者的仕宦经历、地主的庄园生活以及古圣先贤、神话等作描绘。巴蜀地区汉代画像砖、画像石的题材广泛,当世图景与神仙幻想同时并存,主要有舞乐杂技宴饮、车马出行、门阙宅第亭楼、耕作打猎等劳动场景、伏羲、女娲、西王母、仙人等。也涉及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一块小小的方砖面上,人们紧张劳作的情形、乘车出行的情景、对弈的闲趣、歌舞升平的愉悦……都被表现得栩栩如生。巴蜀的画像砖与画像石、石阙并称为巴蜀汉代艺术的三大顶峰,以分布地域广泛、时间连续性强以及艺术形式的变化多样,闻名于世。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成都地区出土的汉代画像砖是一次模印而成,制作工艺师将加工好的泥坯放入木模中制成砖坯,到半干后去掉木模,用刻有图案内容的印模印出各种图案和图像。巴蜀汉代画像砖、画像石非常讲究构图和组合关系,它往往用多块相对独立的构图,拼接起来构成一幅长卷,而每一个画面又是一个单独的情节。在一个墓室中,许多块车马人物砖,拼接起来,就形成了气势恢宏的出行“通景”,成为后来卷轴画中手卷式样的雏形。巴蜀地区出土的大量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和明器陶楼,鲜明记载了巴蜀古代建筑从院落群体组合,单体形象直到构造做法,装饰纹样等建筑特征和地方风格,成为国内研究秦汉建筑发展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巴蜀所保存下来的秦汉时的画像砖、画像石等建筑实物和遗址,其数量和质量,在全国可说是首屈一指的。

四、巴蜀古建筑的研究现状和意义

(一) 研究现状

蜀身毒道,即蜀滇身毒道,是从成都地区出发经云南到达缅甸的国际通道。也是学术界所共识的“西南丝绸之路”,其开通时间在先秦,起点在成都地区。围绕蜀身毒道的研究颇多,分歧不大。巴蜀地区作为蜀身毒道(西南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区域,该区域在中外交流史上的地位可见一斑。巴蜀地区作为南丝路的中外交流、区域交流、地域交流、移民交流的重要区域,涉及政治交流、民族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等多个方面,外来文化与土著文化碰撞后的结合、变化、升华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古文献研究、考古器物研究、民族迁徙研究、民俗变迁研究,而对巴蜀地区的地域建筑研究方面明显不足。

目前涉及南丝路巴蜀地区的古建筑研究,主要是零散的集中于片区建筑研究和民族建筑研究。研究成果方面,早期的有:刘敦桢的《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1941年);刘致平的《云南一颗印》(1944年),《四川住宅建筑》(1954年)等;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云南省设计院的《云南民居》(1986年);叶启荣的《四川藏族住宅》(1989年);唐璞的《山地住宅建筑》(1994年);四川省勘察设计协会、土木建筑学会的《四川民居》(1996年)等;近期有:季富政的《巴蜀城镇与民居》(2000年)、《中国羌族建筑》(2000

年)和《采风乡土——巴蜀城镇与民居续》(2008);戴志宗、杨宇振的《中国西南地域建筑文化》(2003年);毛刚的《生态视野——西南高海拔山区与聚落》(2003年);赵逢的《川盐古道:文化线路视野中的聚落与建筑》(2008年)等。而这些研究主要是集中于地区建筑研究,而针对蜀身毒道的巴蜀的古建筑研究资料极少且零散。另外前述这些区域性古建筑研究又往往偏向于建筑结构、构造特点、功能性质等的研究,而对于这些区域建筑和构件(如民居)特点和演变过程,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这里还有另一个问题,中国古建筑大多以木结构为主,所以大多古建筑难以留存下来,也给今天的古建筑研究带来极大的阻碍。

另一方面,经过几十年的探索,近年西南地域建筑研究目前已从单体的建筑研究进入人居环境中聚落层面,而且研究角度在多学科交叉中不断扩大。但是,经过仔细研究发现,许多研究的角度和个案往往显得孤立、分散和片面性。另外南丝路巴蜀古建筑和聚落的研究,历史的考辨和研究方法与研究理论单一占据着课题研究的主流。也许是该地域的古建筑、古聚落涉及通道上诸多民族的生活和生产世界,涵盖了诸多文化物种,极易使人迷失在这些相互交错的网络之中。因此需要建立起一种整体、系统的研究框架,需要更为清晰地梳理出巴蜀片区,围绕该国际通道上古建筑的各种文化要素关系。同时沿着通道的交流路径建立关联点,这对拓展巴蜀地区和西南丝绸之路的地域建筑文化研究,破解南丝路的诸多文化研究难题,尤为重要。

(二) 研究意义

从建筑学以外学科入手,由外入内。针对南丝路巴蜀地区,从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出发,从民居建筑历史演变和构件特点考察;结合建筑史,对该区域上的古建筑结构、构造、功能,按时序和对外交流的方向进行梳理,围绕对外双向交流为中心线索,拓展出南丝路巴蜀古建筑、聚落的独特探索研究路径。

古建筑是文化精神的载体,认知蜀身毒道的巴蜀古建筑,可进一步认知此国际交流通道上丰富的文化内涵。某种层面上,这些巴蜀古建筑是南丝路兴衰的历史记忆符号和文化交流发展的链条;因为任何一座古建筑、构件变化都是因当时历史条件而引起的,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发展水平、工艺技巧、艺术风格、民俗习惯、民族特征等。不管一座古建筑如何破旧,其文化内涵与千年历史痕迹是无法替代的。研究巴蜀古建筑,就是研究南丝路的历史,展示南丝路文化,载托南丝路的灵魂。

研究古建筑可以说是逆时代的工作,尤其是研究蜀身毒道上的巴蜀古建筑。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社会对于中国古有的建筑及其技艺多加以普遍的摧残。南丝路上巴蜀古镇和古聚落,近年来受西式楼房盛行影响的程度逐渐明显。以原有古建筑为陈腐,虽不是蓄意将原有古建筑(民居)完全毁灭,但在事实上,这一线路上原有很精美的古建筑物多被拙劣幼稚的,所谓西式楼房,或门面,取而代之。充满非艺术之建筑、非民族之建筑、非地区之建筑,芜杂可晒。避免巴蜀古镇节点成为一个又一个中国现代城镇统一复制品,其迫切程度可想而知。

巴蜀地区背靠青藏高原,绝大部分处于山地高原地带,且蜀身毒道上的建筑基本都属于山地建筑类型。从基本国策看,占国土70%的山地地区只占GDP的30%,上山是我

国国土开发战略的重要方向。在西部大开发和社会和谐发展的背景下,南丝路及其续存千年生态文化研究,最好的物证研究为古建筑研究,推动此课题就为强化上山及和谐发展计划,为提高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为提升资源合理利用的战斗力和战斗力,为尊重自然的精华发展,将会提供取之不竭的动力资源。

五、巴蜀古建筑的主要观点和研究内容

(一) 主要观点:

在蜀身毒道的历史研究成果基础上,先结合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对巴蜀地区先秦至汉唐时期古建筑遗址等进行考证,再进一步借助巴蜀现存明清时期古建筑遗址演变、特点和原因来反证其演变初期的雏形。细节的把握上就是从建筑细部构造或者构件细微之处的变化,来清理出与外界环境变化的关系。

巴蜀古建筑演变(形制、功能、材料)和特点。既有受到土著风俗、地域环境影响,外来文化、交流事件的冲击,又有为适应民族迁徙、农业发展的需要,从而结合生产、生活方式进步等因素。如:沿灵关道(牦牛道)从四川盆地汉式穿斗木结构到川西滇西北碉式建筑,到川西彝族穿斗式(梁柱析架和拱架式),到滇西北井干式建筑,再到滇南竹楼干栏式建筑,以上就是沿通道可以看到多元交流条件下形成不同的地域建筑。

沿此西南夷道,先探究巴蜀古建筑个体的演变,再逐渐引申到关键节点的巴蜀古聚落研究当中。由节点聚落类似和近似之处,反穿到与之演变相关的各个上游作用因子身上,从细微之处来观察这些因子起的多元作用——对巴蜀古建筑聚落的影响。由此可反证蜀身毒道区域性的、跨疆域的、立体复合的多元交流的方式及其流向,求证出这些遗存到今天的社会遗传因子仍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二) 研究内容

蜀身毒道(南丝路)研究,是个跨区域、疆域、民族、时期等因素的综合研究项目。不是靠一两个项目就能够完成的研究课题,更不是靠一两个研究成果能够讲解清楚的课题。只想从这种务实、可靠的物质文化身上来进一步印证——这一路径的更大范围为非物质文化的研究。更关键的是弥补了该通道上巴蜀古建筑物证研究的空白。蜀身毒道是开辟时间最早的古代国际商道。因商而起,引发一系列多方面交流事件发生,涉及了多个学科和门类的综合研究,是长江流域三大文化板块和外域文化的历史冲击下,形成的民族交融大通道。本课题研究将提供更大范围和方位的研究视野,发掘外来文化与土著文化融合的多元研究环境。

借助历史人类学研究成果,通过古建筑这一留存时间长,不易消亡的物证途径,来融合求证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也就是从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等传统研究途径以外的途径,用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方法来提升该类课题的研究层次和扩展研究角度。

通过巴蜀古建筑和聚落研究,来拓展南丝路的研究方向,丰富其研究的内容。“适者生存”这一古老法则同样适用于古建筑演变,体现在其结构、材料、空间、功能等的变化,体现出推动其变化的各种因素,即外来文化因子适应地域因素后的变化,同时也提升了交流结合层次、扩大了交流方向。其对今天南丝路研究和拓展,将提供应用研究的

第一章 巴蜀地区的古建筑概况

1.1 秦汉时期巴蜀建筑概况及影响因素

1.1.1 秦汉时期巴蜀建筑概况

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慎王五年（公元前316年），……遂灭蜀，灭之。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引自《华阳国志·巴志》西晋·常璩著，唐春生等译，重庆出版社，2008年，297页）。秦灭巴蜀，对巴蜀以及秦史具有深远的影响。秦在巴蜀的统治时间为110年，远长于其在全国的统治时间。秦攻占巴蜀后，根据巴蜀两地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情况，先后在巴、蜀两地实行了郡县制。对于巴国，正式改设巴郡，郡下设县，郡治建在江州县（今重庆市）。而对于生产力相对发达的蜀国，最初采取分封制，后时机成熟取消蜀国国号而正式确立蜀郡。秦在公元前312年，从巴蜀分出部分土地成立汉中郡（见图1.1.1）。秦入巴蜀后，巴国、蜀国灭亡。中原文化的传入和大批移民的涌入，使得巴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手工业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与发展，从而使得巴蜀文化的发展达到了又一个高潮。巴蜀地区的城市、建筑也得到高速发展。铁质工具的广泛应用，木工、制陶业的发展，促进了巴蜀地区建筑的进步；经济、交通的发展，促进了筑城技术和城市布局的改变，并且兴建了成都、江州等城市。秦时李冰任蜀郡守时期，还在巴蜀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其中都江堰举世闻名。巴蜀进行的这一系列的水利建设，使成都平原的农业、经济等得到长足的进步。（引自陈世松的《四川简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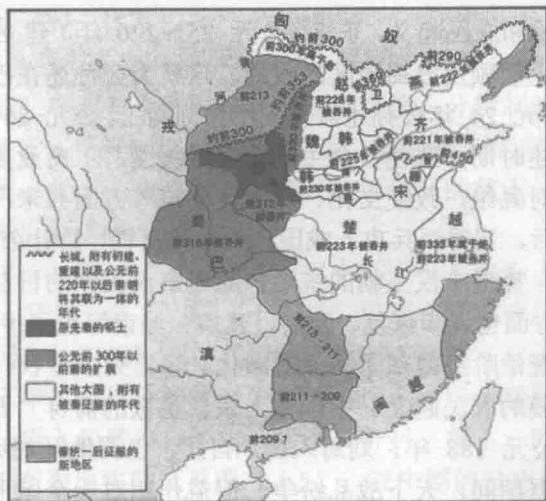


图 1.1.1 秦时巴郡、蜀郡、汉中郡在全国的位置

经过秦末农民起义战争，刘邦为汉中王，统治汉中、巴蜀等地。他大力发展军事、商业、农业，促进了巴蜀地区的经济发展。公元 206 年，西汉王朝建立。汉承秦制，西汉仍设郡、县二级。在今四川地区仍设巴、蜀二郡，同时从巴蜀分出广汉郡。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达到了极盛时期。其在巴蜀故地设立益州（引自任乃强的《四川州县建置沿革图说》，巴蜀书社，2002 年）。益州成为郡的上一级行政区，形成州、郡、县的地方行政区划。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巩固，汉武帝大规模向边疆扩张，为现代中国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这使得巴蜀地区建筑、城市更加繁荣。（见图 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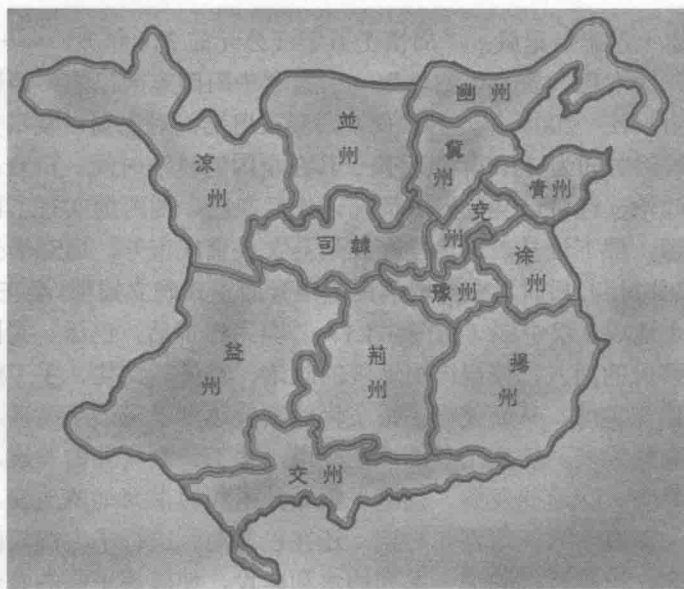


图 1.1.2 西汉时期益州在全国的位置

经王莽的短期统治和农民起义，东汉（公元 25~220 年）建立。东汉王朝建立初期，政府疲于巩固政权，无暇顾及巴蜀地区的政局。这就为公孙述在巴蜀地区建立的割据政权提供了客观环境。公元 24 年公孙述盘踞成都自称蜀王，公元 25 年，自称“成家皇帝”，国号曰“成”。公孙述时期，致使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工商业萎靡。但由于公孙述割据期间，巴蜀地区相对隔绝，致使文化、艺术、建筑等方面并未严重受到战火的影响。当东汉王朝得到巩固后，刘秀派兵攻入成国，大成国灭亡，总计公孙述在蜀统治十二年。西南夷各族相继归附，接受东汉王朝的统治。随着东汉王朝的日益稳固，巴蜀地区的经济、文化、手工业等方面也逐步恢复、发展，建筑、城市等也逐步达到当时的先进水平。

东汉末年，东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逐渐激化，宦官外戚专权，政治日益腐败。四川地区逐步出现大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前身“五斗米教”也在这一时期产生并发展起来。公元 188 年，刘焉入蜀。自此，巴蜀地区刘焉、刘璋父子割据局面形成。在刘焉父子割据期间，天下战乱纷争，但益州相对于全国形势较为稳定，经济文化等保存较为完整，为这一时期的建筑发展提供了基础，也为蜀汉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见图 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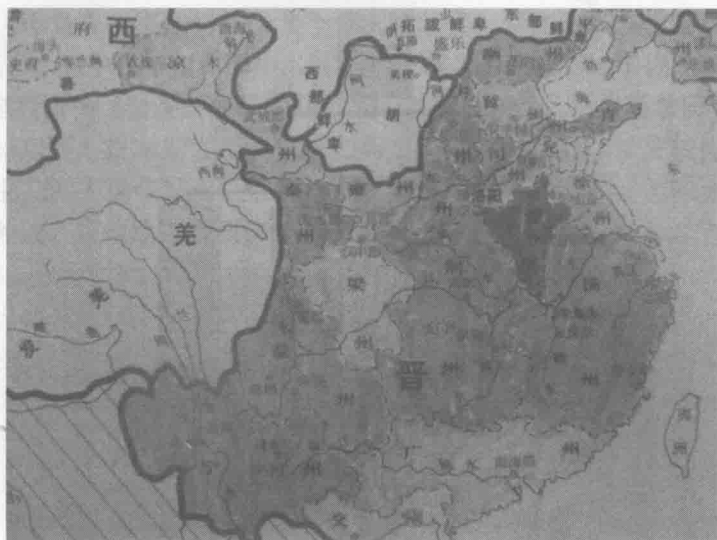


图 1.1.3 东汉时期益州在全国的位置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的经济处于发展时期，文化达到一个鼎盛时期。为巴蜀地区的建筑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巴蜀地区发现的大量汉代墓阙、崖墓，是厚葬成风的体现。同样也是巴蜀地区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结果。

1.1.2 秦汉时期政治、经济对巴蜀建筑的影响

1.1.2.1 秦汉时期政治对巴蜀建筑的影响

秦在占领巴蜀后，根据巴蜀地区民族众多且自主性较强的具体情况，制定并逐步完善了一套特殊的统治政策。这些政策当中，以郡县制的推行和移民迁徙迁虏等政策对巴蜀地区的城市、建筑的发展最为重要。汉承秦制，汉代基本沿袭了秦时的郡县制，秦汉时期的政治制度基本处于同一体系。

1. 郡县制的推行

商周时期的分封制，在商鞅变法时已经从秦国废除。分封制的弊端在于分封的诸侯在其蜀国掌握军权、政权，使得中央权力过于分散。而郡县制的实行（见图 1.1.4），有利于秦国加强中央集权，便于中央政府对地方及边缘地区的统治，为秦统一六国并巩固在六国故地的统治提供了基础。

据《华阳国志·巴志》载：“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三十一县。”秦最初在巴蜀地区设置巴、蜀、汉中三郡，下辖三十一县。巴郡在三郡中最先设立。而蜀郡的设立有所反复。《华阳国志·蜀志》载：“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郡。……三年，分巴、蜀置汉中郡。……三十年，疑蜀侯绾反，王复诛之，但置蜀守。”最初司马错入蜀曾担任蜀守。后秦又分封三蜀王，时机成熟后废蜀王，只设蜀郡守，郡县制真正在蜀地实行（见图 1.1.5），汉中郡的设立在巴郡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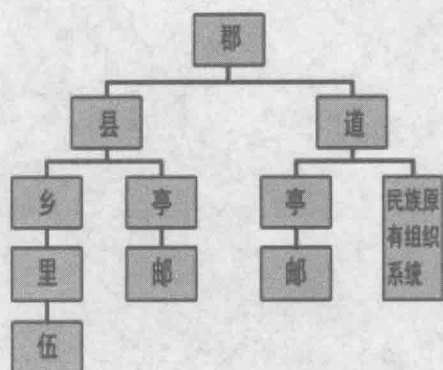


图 1.1.4 秦郡县建制关系



图 1.1.5 秦时的巴郡、蜀郡、汉中郡

汉初在四川地区依旧划分为巴蜀二郡。公元前 201 年，将巴、蜀各划出一定土地设置广汉郡。公元前 135 年，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今四川地区便有巴、蜀、南（大部分在今湖北境内，四川仅临巫县）、广汉、犍为、沈黎、越西、汶山这八郡之地。公元前 106 年，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于全国设置十三部刺史，各督察一州之行政，在四川置益州部（见图 1.1.6）。益州之名从此开始（引自罗开玉的《四川通史》（第二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 年）。郡县制的实行，是封建制王朝中央集权的表现。其目的在于缩小行政区，对巴蜀地区能够实施更好的政治、经济管理和开发。各个郡直接由中央政权负责，巴蜀地区新的城市体系逐步形成。

大批县一级的城市的设立，使得巴蜀地区大批城市迅速发展起来。秦灭巴蜀前，川